

艾苓. 王维华作品 ○
Examination

考试

艾苓·王维华作品◎
Examination

考试

大连出版社

© 艾 芩 王维华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试 / 艾芩, 王维华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684-756-5

I. 考… II. ①艾…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366 号

责任编辑: 卢 锋 李 岩

封面设计: 林 洋

责任校对: 杨 琳 于孝锋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674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 cbs@dl.gov.cn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 面 尺 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出 版 时 间: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4-756-5

定 价: 30.00 元

考试

001- Chapter 1

021- Chapter 2

043- Chapter 3

123- Chapter 4

175- Chapter 5

209- Chapter 6

考试

Chapter 1

地理和历史还一点儿都没看呐！

虽然我心里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始终带有简陋得不足以被人所轻易觉察到的自信和骄傲，并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时刻，在我所能接触到的恰当的女孩子面前信手拈来关于世界上最高山峰、最长河流、最大平原的名称和准确无误的数据，或者历史上那些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年代和款项的具体内容，从而轻而易举地增加她们对我本就持有的喜悦，以及她们因自己该方面知识的匮乏在悔恨之下用付出身体的办法去弥补这一悔恨的决心和速度，可毕竟考试就在眼前了啊！

多瑙河具体流过了哪几个国家我已并不十分清晰，或早就遗忘了；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赔偿的白银我老是和《马关条约》中的数量相混淆；世界上出产剑麻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还是埃塞俄比亚，也有待查实——我确信相关的内容就在书的第104页；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消灭的日伪军数量，我总是时记时忘……

可明天就要进考场了！来不及了！

四周黑蒙蒙的，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不停地奔跑，想赶快回家去翻看那些不知早已丢到了哪里的课本。一会儿又坐上了火车，在人头攒动的车厢里使劲儿往前挤着，想赶快到房后河边的大树下看书。可怎么也挤不出来，一身的汗……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嘛？怎么又得重新考呢？

我又在火车上了。车上依旧人多，到处塞得满满的，无从下脚，杂七杂

八的声音与污浊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拿着满满一手烧鸡的小贩照旧从人缝中挤过,不停地叫卖。一对儿男女只顾罩在衣服底下摩挲着……

我满头大汗,在美院的校园里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四处打探专业课的成绩。一脸严肃的教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告知以前的卷子全作废了,都得重考。我钻进了厕所。蹲坑的门上画满了交媾中的人体……

明天就要考试了啊,可怎么也找不着相关的课本。家里的书柜、仓房里的纸壳箱子以及教室里的课桌都翻了个遍,还是找不着。急忙骑车去问几个同学借,都说以为不会再用到了,早就当废纸卖啦……

坐在考场上,什么也不会了,内容都改了,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马上就要到点儿,可自己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心里催促着自己赶紧写赶紧写,可一点劲儿也没有,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吗?怎么又得重新考啊!

……

几年来,我老是在这样的梦境中惊慌失措,怎么也睁不开眼睛。那种焦急,就像童年的梦中看完《列宁在1918》,想小便,却苦于到处是人、到处也找不到厕所时所感觉到的紧迫。

那是一种带有深深不安的焦虑。那种焦虑对我来说总是伴随着担心的过程,因为相同的结果无数次证明,等找到厕所,或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畅快淋漓了之后,等待我的便是褥子已被尿了个精湿的事实。

但正像多次不得不对付月经来临的女孩子那样,阶段性的重复也使我后来具有了对付这种梦境的初步经验:梦里要一直怀疑梦的真实性,并努力强迫自己赶快醒来,以享受醒来时那梦境并未真实发生的喜悦和快感——我不用考试,我已经是一所令人羡慕的著名高校的毕业生,而且我也曾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的高校里拥有过测考别人的机会和权力。

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童年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来,不得不被我的尿炕事件牵连进去的妈妈总会为我承担案件的连带责任,暂时在褥子上被尿湿的部位铺上千爽衣物,以解当务之急,让懒得睁开眼睛的我能够继续在干爽中睡去,从而把事件对我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二哥就没有我这样的幸运:虽然童年相同的梦为他提供了相同的发案几率,但他却只能在睡眠朦胧中匆匆估计了现场的位置和面积之后,换一个尽可能使自己少挨着那片儿潮湿部位的姿势坚持睡去。直到天亮。

这能怪谁呢?养活着多个孩子的中国家庭,按照惯例,母亲总是和最小的那个睡在一起。从这一事实出发,我自然具有母亲为我随时垫衬衣物唯一合法性的解释。

显而易见,我的幸运在于我在这个家庭中出生的次序,而二哥的不幸,也正在于同样是次序所导致的不可更改的结果。但事实上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样的次序安排,以及次序所带来的优越,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得来的,并不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加以确定。

然而,谁又能为这样的考试内容准确地命题呢。

这一次未经考试就轻而易举得到的资格并没有使我沾沾自喜,恰恰相反,在我身上似乎从来就不能真正发生作用的理智竟让我对此深感懊恼——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的优越和特权由于这一次序理所应当的确定,似乎让我总是相信和等待世界永远被这样确定下去的那些机会和理由。

从如今依然清晰可见的记忆来判断,我小时候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以被归入到聪明孩子的行列中去的:我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妈妈费尽心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藏匿糖罐的地点;那次和几个小伙伴爬树,不幸遭遇看管树林的老杨头追赶,情急之下刮破了短裤之后,我总是以各种理由避免再次穿上那条已被妈妈缝补一新的短裤,为的是怕给老杨头从来就不知疲惫地保持着机警的眼睛提供了爬树时所留罪证的唯一可能;在成功地掩护二哥从

布满铁丝网的果园里取出几个掉落在地面的苹果后，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提醒他洗去上面可能依旧残留的农药，并时刻警惕着过往的路人，当有穿着军装的人经过面前时，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去阻止他掏出衣兜里的果子——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才具有足够的能力，一眼就认出我们的果子并不光彩的来历。

我生活在一个建设兵团。父亲是团部基建科的技术员，母亲在学校里忠诚着党的教育事业。早年，在“扎根边疆、建设祖国”的歌声号召下，父亲像天空中的云朵，从千里之外的海滨飘落到这片人烟稀少的荒滩上，一边品尝着尚未成熟的青春，一边支援着西北的建设。接着，母亲寻歌声而来，与父亲飘落在一起。后来，等我们一个个匆匆忙忙地到齐了，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扎下了根。

高高的水塔沉默地守望在清晨燃烧的天际和黄昏的薄暮中，成为我儿时寻找家的坐标。但那并不是这里最高的建筑，最高的建筑是父亲后来设计的洗澡堂上空的大烟囱。尽管大烟囱上有避雷针在电闪雷鸣的阴霾里安全地摩擦着天际，可每次风雨过后我还是放心不下，总爱去查看一番那个庞然大物是否还毫发无损地矗立在原地。团部办公室一排排砖红色的房子戴着墨绿色的屋檐，整齐的装束与周围四个圆形的厕所里消毒的石灰粉一起散发出同样清洁的气味，每一天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喇叭里吹响的提醒人们准时作息的号声。医院正门上方闪着万道金光的毛主席头像和招待所墙壁上的革命标语，是我童年的目光最爱停留的地方。那逼真的头像和齐整的美术字可是这里最高级的艺术了。从团部到供销社大道的两旁，兵团战士们不知什么时候栽下的树木从我懂事起，就一直郁郁葱葱地陪伴着我的记忆，水渠里片片的蛙声也总是像时钟一样按时宣告着每个春天的来临。满渠的春水，河岸边宽阔、翠绿的树叶，枝头婉转啼鸣的鸟叫，填充在清凉的季节里，与父亲设计的那些建筑物一起，构成我孩提时代快乐的心灵地图。

开始的时候,是二哥领着我在这张地图上一遍遍搜索着欢乐。我们喜欢到团部去找父亲,在父亲施工的工地上偷偷蒙混着特权,顺着脚手架爬上爬下,欢快中惹得父亲不断怒喝。于是,哥俩又流窜到机运连,在一片废弃的机械里手忙脚乱地开动着自己眼中的坦克、大炮,嘴里不断发出同步的声响,与电影中看到的敌人艰难作战。遭人追赶后,二哥只好带着我到母亲的学校碰碰运气,穿过一片片朗朗的读书声,准确地来到堆放着各种教具和仪器的库房后墙根儿。在二哥的鼓励下,我学着小人书上解放军的样子,硬是用自己幼小的身体架起二哥从库房的后窗望进去,想探个虚实。可不曾提防笨拙的二哥扒拉掉了挡在窗上的土坯,噼里啪啦地砸落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却不敢做出有任何疼痛的表示,因为砸得太轻,并未挂彩,心里明知够不上英雄般头缠绷带的光荣,还会落下个“一点儿也不像潘冬子”的名声。回家的路上,我渐渐醒悟过来,暗自思忖:即便够不上英雄的资格,可总应该享受个工伤的待遇吧?!于是越走越慢,磨磨蹭蹭的,想让二哥背我。二哥听罢这要求,敏捷地向前疾跑几步,在我的哭叫中不得不停下脚步,背对着我,撅起屁股,做出背的姿势,从胯下喊道:

“过来过来,背你!背你!”

等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刚想爬上那背,他却又猛然起身向前疾奔,又一次在我的哭嚷声中停住,做出再次要背的姿态,等我上前,他又故技重施,总也不让我得逞。就这样一段儿一段儿地把我骗回家,弄得我是徒有一肚子的好委屈可又无法向父母申述,因为我知道,父母绝对不可能承认那工伤的正义性质。

忽一日早上醒来,不见了旁边等待的二哥,习惯性地大哭一阵后,还是没能招来以往早该有的回应,才猛然间想起二哥已经上学了。于是我只好抹掉已滑落到腮边的泪珠,收拾起伤心的往事,自己套把上衣,踩着墙角边高高的凳子锁牢房门,将钥匙挎了脖子,带着脑海里先前留存的经验,按

地图独自去搜寻欢乐。

没有二哥带领,光我一个人出没,似乎目标一下子变小了,在以前那些总是要被禁止实施乐趣的地点,人们再也懒得来发现我了。由于二哥言传身教的隐蔽技巧总也派不上个用场,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无聊,总觉得这一次轻易就到手了的快乐一点儿也没有跟着二哥的时代里那般有滋有味。几天后,我的隐蔽技巧才好不容易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应用了一次。那天爸爸正坐在桌子前埋头画图,天热,办公室的门开着,爸爸脚从鞋里抽出来,搭放在桌下的报纸上。我左右侦察了一番,确定没有情况后,便猫着腰迅速摸到了桌子底下。桌子下除了阴凉的水泥地面和爸爸搭放在报纸上的脚外,也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玩的。我夹紧了嗓音,学了一阵苍蝇“嗡嗡”。爸爸还是没有发现。于是,我的手又尝试着像苍蝇的前爪那样轻轻地落在爸爸的脚上,去搔痒他的脚心。结果力量用得可能不太像,爸爸脚猛地一缩,探头下来看发生了什么。见是我,爸爸咯咯地笑了,问我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儿声响也没有,还以为下面是小耗子呢。我对自己这一次的隐蔽相当满意,便听话地去翻腾墙角边那几个大卷柜的抽屉了。下班号吹响时,工地上的老郭胳膊窝里夹着一卷儿图纸走进门来。我躲闪不及,只好又一次任他那一脸总是粗硬无比的胡茬子蹭在我的脸蛋子上。在爸爸的笑容纵容下蹭够后,老郭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作为给我的补偿。那么多。我两只手都合拢了,还是捧不下,有几块儿掉在了地上。我连忙蹲身去拣,可手里的又直往地上掉。

没过多久,我也轰轰烈烈地提前张罗起上学的事情,不但表现出具有明显学习特征的行为,而且还忙乎着寻找和捍卫与二哥拥有一样文具的机会以及占有相同数量的权利——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次绝不肯轻易让步的坚持,只是我出于对上学这码子事儿还远未了解的朴素热情,而非迫切渴望得到知识的真实需要。

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儿整日凑在一起，跟着其中一个小姑娘赋闲在家的爸爸，在自制的小黑板前兴致勃勃地识起字来。小姑娘的爸爸据说20多岁就当上了营长，后因不知什么作风问题被解除了职务，虽然不用上班，可工资待遇什么的一样都不少，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教学上却有着自家的独门绝技，总能用自创的土办法来加强我们的联想和记忆。领我们识字的时候，他尽可能把每个字的发音和根深蒂固的方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达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目的。比如“麦子”，本地的方言叫“咩子”；“蜻蜓”，本地的方言叫“河洗洗”，于是教“麦”和“蜻”这两个字的时候，小姑娘的爸爸就会这样领读：

“mài,mài,咩子的麦,咩子的麦;qīng,qīng,河洗洗的蜻,河洗洗的蜻……”

我们学着小学生的样子，把手认认真真的背在后面，跟着他起劲儿地读着。读罢，像是比赛似的，急于看谁第一个把方格本子写满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码。因为在我眼睛的余光里，先生正背着手功成名就地看着我们呢，把他显然是在赞许其中某一个的目光在笑容的掩护下撒向所有在场孩子的脸。那种近似监考人的目光其实是在为每一个孩子上学后应有的表现做着经验丰富的预先判断，同时也热心地义务为那些被他丰富的经验所早早就淘汰出局的孩子努力寻找着理所应当的出路：要饭，淘厕所，或者种大地，尽是些没人愿意从事的工种。这种目光不但迫使我尽量加快着手上的动作，也误导了我对上学盲目而轻率的热情。

我上学的时候只有5周岁。由于高涨的热情无论如何也无法提升年龄偏低的事实从而达到学校有关入学规定的标准，妈妈的同事含着笑，拒绝着我——过后看来，她并未坚决抵抗的拒绝其实只是对我当时居高不下的欲望一个小小的考验而已：因为，在我背着多少天来就已挎在身上不舍得摘下、早在去报名之前就已经背了一个多小时的新书包，满泪水地扑向坐在

邻桌的妈妈怀抱那一瞬间,这位漂亮的北京女知识青年忙起身喊着:

“过来过来过来,给你报名,给你报名。”

是我迫切的泪水赢得了她随后接受的笑容,还是她之前拒绝的笑容骗取了我天真的泪水,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但肯定的一点是,我的泪水和她的笑容一起让我成为了她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个学生。

显然,我的入学从表面上看,是大人们眼中一个孩子真诚的可爱通过了考试,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有着教师身份的妈妈让我具有了提前入学的资格。我人生的这次小小的应试,其实是我的母亲所从事职业的偶然性对我在家庭中因出生次序而得来的那种优越和特权再一次完好无损的保存和延续。

或许是入学前不遗余力忙乎着跟读和写满本子的热情所导致的惯性冲力,或许是爸爸出差总给我们带回来的小人书潜移默化的启蒙作用,反正开始上学的初级阶段,我总能带回家语、数双百的考卷。每当那个时候,大哥在父母从不掩饰的笑容下把我高高地举在空中:在我看来,这祝贺比他自己多少次给父母带回荣耀时更加热烈,当然也比姐姐和二哥得到好成绩时的场面更显隆重。在一个读书显然不会给家里带来直接收入和实际利益的年代里——大哥的同龄人都已纷纷听从父母的安排,补员的补员,顶替的顶替,每月给家中交回十五块四的工资——在我所谓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又有什么能比考试得来的好成绩更加增添喜悦的气氛和凝聚的热量呢?

因此,因考试成绩而备受褒奖的那种期待不知不觉构成了我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那种热烈而隆重的喜悦,从未因岁月不停的流逝而磨损掉丝毫的热度和分量,多少年后,依然随时能被调拨出来温暖和慰藉我每感到困惑的心。

但上学后不久,我就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眼泪所赢得的让我提前踏入校门的权利,其实是我人生早熟的激情所无法挽回的一个错误。至少,对这个

显而易见的错误应该负连带责任的,除了天天清晨妈妈像闹钟一样准确无误的起床叫喊声之外,语文课堂上我总是概括不完整的中心思想也难逃其咎。前者干涉了我真实的梦境得以继续的长度,后者阻碍了我虚幻的想象不受限定的空间,让我脆弱的意志终于移情别恋,重返现实的需要,去寻找更为快乐的途径。

我仿佛是一个薄情寡义的浪子,在抛弃了先前的恋情之后很快就深深地沉迷于除上学之外的多种欢愉之中: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把废旧的纸张叠成四角,以烟盒样式的稀罕和纸质薄厚的程度论价,为了输赢,和小伙子们直扇到胳膊酸痛,浑身无力;在地上画个圈儿,里面放上从靶场捡来的弹壳,小心翼翼地把铁蛋儿弹到靠近圈儿边的位置,瞄准里面占据了我所有欲望的赌物,指尖用足了浑身的力气往外射击,为了得到更多的数量,直杀到昏天黑地,惹得家里“吃——饭——”的呼叫声四起。通过多次的经验教训,我切记一定要找到实力较弱或相当的对手再下手去玩命不迟,否则弄得个血本无归还得央求哥哥们去翻盘,遇到不讲理的主儿死不承认这一潜规则的有效性,弄不好就得大动干戈,好不麻烦。为了春天来临的鸟儿,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精心准备着:用粗号的铁丝做成架子,从废旧的自行车内胎上剪下两条宽度一样的胶带,再从旧皮包上裁下一块儿包皮,大小正好容纳得下一枚足可以致鸟儿于死地的石子儿,结结实实地捆绑在一起做成弹弓。接下来,便是四处搜索称心如意的子弹,沉甸甸地装满衣兜,大中午的也不睡觉,像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弓着腰,踮着脚,满树林追杀四处惊窜的鸟雀,露天烧烤前,还不忘向伙伴们炫耀一番战利品的数量和品种。当然也不会错过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几十个人翻找着提前藏匿在各个犄角旮旯里的废电池和纸条,按照上面的指示,房前屋后满世界地搜寻着狡猾的特务,成功抓捕后,还不忘开个公审大会,宣告罪行,执行枪决;或分成两拨,各占一个山头,用土坷垃激烈地对攻,有统帅全军的司令,有克己奉公的基层

军官，有通风报信的侦察小分队，有运送弹药物资的后勤机关，也有随时准备包扎抢救的卫生员，但大多数还是不畏枪林弹雨、英勇顽强的战士，其中还真不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模，带着几个鞭炮硬是冲上去炸碉堡，头上挨几个包也在所不辞，精心演绎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整个战场上尘烟弥漫，杀声四起，胜利的一方在占领的阵地上插满用红领巾临时做成的旗帜，首长也不忘高声宣布：

“同志们，我们胜利啦！”

引得底下欢声雷动，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尽情还原着电影中的镜头。我当过几次英模，也曾光荣负伤，流着鼻血却把最高荣耀的绷带缠在头上。

这些不被打扰也不受限制的游戏内容在我这个不忠的恋人眼里着实要比上学可爱得多，并让我突然明白先前对她的热情，只不过是把她当成了尚未接触过的陌生游戏而在冲动之下所招致的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足。

尽管我对学习做出百般的虐待和最无情的背叛，但联姻的事实已经存在且无法更改，我不得不痛楚地压抑着内心难言的真情，在躯体已被占据的隐忍中，对这个老情人表面上显示出一如既往的热情，而私下却偷偷地寻找另觅新欢的机会。晚上我们兄妹四个一同温习功课的时候，我已背叛的眼睛总在尽显积极主动的态度中，不易觉察地密切注意着窗户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令我心猿意马的动向：我班上岁数比我大出足可以产生代沟的那个孩子王，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以暴露身体最少面积的姿势，用最快捷和最明了的眼色暗示我出去。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沉着冷静地起身去上厕所，刚一出门，便手忙脚乱地爬上头领早已准备好的那匹来路不明的毛驴背上，在同样的夜色掩护下疾驰而去。

现在想来，那股神气和威风不亚于坐着奔驰、宝马在夜色阑珊的大街上兜风的气派。在我的心里，我身前的驾驭者也无异于日后才从香港片中见

识到的“发哥”：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今天骑来不知哪个连队的毛驴，明天又可牵着某个知识青年的猎狗，让我们这些小伙伴们艳羡不已，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左右的决心和纵横四海的愿望。要知道，能跟从在他的身边保驾护航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和实力轻而易举得来的资格。虽然我不能完全知道他招贤纳士的全部标准，但逃离学习的勇气无疑构成了最起码的及格线。我们骑着毛驴，领着猎狗，耀武扬威地到野外去追兔子、打沙枣、掏鸟窝、偷豌豆，或者是摸摸鱼、玩玩水、晒晒太阳什么的。有时，也和公社的小子们故意制造些摩擦，回家后加紧研制几把先进的火柴枪以壮军威，并密切关注着事态进一步的发展动向，积极准备应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战斗。

那些新欢无需考试的内容，无疑是她们能够毫无悬念地赢得我的心、最终让我死心塌地投怀送抱的迷人之处。我对学习先前满怀的热情早已冷淡了下来，眼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体越走越远，却总也打不起精神去和这个面目可憎的老情人进行过多亲密的接触。

然而，她也绝非是个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贤妇，每当临近考试的时候，无论我如何用尽所有的柔情去百般爱抚，她却总也无法做到全释前嫌、既往不咎的高尚，与我重修旧好。面对可想而知的成绩，她竟能以我同样的铁石心肠，冷漠地看着父亲举起笞帚在我的屁股上留下道道的抽痕，用我受伤的屁股来抚平自己内心长期惨遭冷遇、独守空房的哀怨，似乎想让我永远记住抛弃她所可能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突然有一天，遇到的人们都泪流满面。我不知所措，极为慌张：莫非人们都知道了我不幸的遭遇？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漂亮的女知识青年面色沉重，目无表情，不等惊魂未定的我坐稳，眼泪便淌了出来，沉痛地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随之带领全班痛不欲生地哭成一片。我一下子吓得半死，觉得天塌了下来：美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最要命的是台湾还没解放啊，毛主席不在了，一起打过来可怎么办啊！于是，紧张

地趴在桌子上，配合着大家的动静，不敢再想自己的私事儿。那时担心的真是不无道理，因为不光是我这个小孩子压根儿就没想过毛主席也会像老杨头一样地得病、死去，恐怕就连全体人民在内，可能都以为他老人家永远会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地陪伴在身边，让我们在一切帝、修、反的敌视中安全地生活。没有毛主席的保护，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毛主席怎么也会死呢？丢下孤零零的一国人民，从此在凄风苦雨中不再安全和幸福。反动派们一起打过来可怎么办？还会有电影中永远胜利的场面吗？真是越想越愁啊！

于是，我决定要像小人书里面的小英雄那样，拿着红缨枪去查路条，带着弹弓子去抓坏蛋，去为队伍上送信，去埋地雷，去专门为鬼子引错路，被抓到后打死也不泄漏后方机关的所在地。为此，晚上也曾出去过几次，可无论眼睛怎么机警，却总也发现不了个异常的情况，天太黑了，又不敢久留，因为有个知识青年就在路口那片阴森森的大树上吊死过，只好加快脚步，一溜烟儿跑回家，悻悻地躺进被窝。

那一阵子，到处是哭泣的队伍，每个人都竭力在用震天的哭声挽留已逝的英灵。我挤在满眼是黑纱和白花的人群里，跟着一次次化悲痛为力量。那一阵子，家里那台老掉了牙的收音机使用的频率额外的高，微弱的声音在父亲不断的拍打中勉强清晰着。总是有一大批牛鬼蛇神和一小撮跳梁小丑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伺机出笼作乱，明目张胆地在那儿闹事儿。我有些愤怒了。还是不是人啊？要知道全国人民可都还在悲痛着呢。

幸好又有英明的领袖及时出现，力挽狂澜，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捆绑在一起揪了出来。于是，在敲锣打鼓的喜庆声中，全国的人心又迅速地大快了起来。团部办公室的走廊里和食堂墙壁上的漫画内容又一次作出了调整，工人、农民和战士的装束与神情还是以前的模样，粗黑的眉毛，愤怒的眼神，紧闭的嘴唇，卷起的手臂和铁拳挥舞的动作也一如既往地结实有力，手里握的还是硕大无比的铲子、斧锤、钢笔和扫把，重重驶过的还是以火车头